

创造进化的动力来自生命自身

北京大学哲学系 赵敦华

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柏格森可谓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四大鼻祖”。前三位对“哲学教授”抱有敌意，柏格森却是显赫的学院派哲学家，他担任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法国政治和精神科学院院长等要职。他还是国际活动家，“一战”时代表法国出使美国，促成美国参战，战后担任国际联盟设在巴黎的“国际知识文化合作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主席。192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柏格森在写给评委会的信中说：“诺贝尔奖的尊严在于理想性和国际性。”这也是他的自我评价。他一方面用非理性的直观主义提升精神理想，另一方面按照知识界的理智标准肯定科学技术和国际社会的进步。这两方面的结合充分体现在《创造进化论》（1907年）和《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1932年）两书中。

柏格森对到20世纪初为止盛行的形形色色的进化论作了分类。第一种是机械论的进化论，以斯宾塞为代表，该论把物质还原为原子、把精神还原为生理反应，是鼓吹“生存斗争”的“斯宾塞的伪进化论”。第二种是目的论的进化论，以莱布尼兹为代表，他认为事物和生物由下而上等级分明，处于实现“预定和谐”的计划之中。第三种是达尔文进化论，柏格森认为达尔文“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学说过于消极，把现存的物种看作微小差异积累产生的偶然秩序，不能解释物种的质的差别。第四种是拉马克主义，拉马克“获得性遗传”的学说承认个体努力可以通过遗传改善物种，柏格森比较赞赏这种积极的进化论，但进一步要求“在比新拉马克主义者设想的更深刻的心理意义上理解‘努力’这个词”。柏格森把个体“努力”所产生的进化解为“存在在于变化，变化在于成熟，成熟在于不断自我创造”的生命历程，他称之为“创造进化论”。

创造进化的动力从一开始就在生命自身之中，柏格森把这种“神奇的内在冲动”称为“生命冲动”。但进化既有内部动力，也有外部阻力，对生命冲动冲破阻力的进化过程，柏格森用炮弹炸成碎片形容“生命碎裂为个体和物种”，又用高压蒸汽喷射时落下水珠比喻说，向上喷射的生命流落下的水珠便是物质世界，而继续上升的生命冲动最后进化为人类精神。

进化过程的第一阶段分化出植物与动物两支，植物的进食方式把直接从空气、水和土壤吸取营养的生命功能发展到极致。第二阶段动物分化为脊椎动物与节肢动物两支，节肢动物的运动器官多，每个器官有特殊功能，运动灵活，易于逃避和攻击；而脊椎动物的运动器官集中在两对肢体上，多数动物的肢体功能分工不明显，只有人类的手是最完全的运动肢体，可以完成任何工作。人类进化则有智慧和本能两种倾向，都是“预先存在的灵魂”，不同之处在于，“智慧朝向意识，本能朝向下意识”。智慧最初是制造工具的技艺，在发明和制造工具的过程中，人与身体相关的意识发展为理智。理智的特征是分析，是从整体到部分、从运动到静止的几何与逻辑的科学方法。科学具有巨大的物质力量，但摆脱不了机械论、目的论与决定论，不能把握生命的本质。哲学家和艺术家通过对生命本身的直观把我们从仅对生活需要的关注中解放出来，扭转了理智思维的习惯，给予人类进化新的创造力。

人类智慧（理智与直觉）与本能的区分还可引申到道德、宗教和政治领域。人类本能创造的道德、宗教和社会的特征是封闭和静态，最初的小群体具有已被膜翅目动物发展到极致的防卫和攻击特征。但是，生命的创造进化是不可遏制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变化总是首先发生在少数英雄和圣徒身上，他们把对家庭的爱、对祖国的爱、对人类的爱一步步推广开来，最终怀抱人类，广及动物、植物和大自然全部。西方文明产生的工业主义使人摆脱饥荒，并在这种开放道德的基础上建立起开放社会。

柏格森认为开放社会的格言是“自由、平等、博爱”，而与想象中封闭社会可能提出的格言“权威、等级、仇恨”相对。但柏格森对人类未来并不乐观。他看到，原始的封闭群体发展成为现在规模更大、危害更烈的封闭社会，现代封闭社会用“理性、自由”装饰的整体规划依旧是“本能的领域中蚂蚁巢穴和蜂窝窝的设计”。封闭社会对内为眼前政治需要滥杀无辜，如同“工蜂在认为蜂房已不需要雄蜂时便把它们刺死”；对外则把攻击的本能发挥到极致，由于“我们文明所铸造的武器”，现代战争“造成的屠杀规模是过去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柏格森的预言不久后即被“二战”所验证。1941年1月，纳粹德国占领军强迫巴黎犹太人登记，柏格森在寒风中站立数小时，罹患肺炎。他与前来探望的人若无其事地谈哲学，最后像平常下课时那样说：“先生们，五点钟了，课程到此结束。”言毕溘然长逝。